

Europe Cultural History

欧洲文化史

[荷兰] 彼德·李伯庚◎著



*Europe
Cultural
History*

欧洲文化史

〔荷兰〕彼得·李伯庚/著
赵复三/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洲文化史 / (荷兰) 李伯庚著；赵复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ISBN 7-80681-354-3

I . 欧 … II . ①李 … ②赵 … III . 文化史 – 欧洲 IV . K5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6823 号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09-2004-557 号

Europe A Cultural History © 1998 Peter J. A. N. Rietberge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欧洲文化史

作 者：〔荷兰〕彼得·李伯庚 (Peter Rietbergen)

译 者：赵复三

责任编辑：张广勇

文字编辑：邓 波

版式设计：桑 雪

出 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20 上海市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发 行：新华书店 共和联动图书有限公司 (010-64959556)

印 刷：三河市铭浩彩色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20

插 页：16

字 数：590 千字

书 号：ISBN 7-80681-354-3/K·087

定 价：3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我的中国读者们：

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总梦想他所写的文字能有读者，而且愈多愈好。这是一种人所共有的真情。而有的时候，这个美梦竟然得以实现到超过人所能向往的程度。一个荷兰历史学者用英文写作的《欧洲文化史》得到一位中国同事建议，把它译成中文，就仿佛是中国这个拥有伟大传统文明的国家把它的大门敞开了。

中国对世界其他文化所作的贡献，是怎样估计也不为过的。多少世纪以来，许多中国的思想和器物，从东亚经过海路，跨越沙漠，到达欧亚大陆的西部。欧洲文化在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交流中，得益最多的可能就是和中国的文化联系。

令我高兴的是，1675年，把孔子的《论语》首次以有韵脚的欧洲语言，翻译出版介绍给欧洲大众的，是一位荷兰人彼得·范·霍恩(Pieter van Hoorn)。他在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驻中国清廷的使节之后，做了这项工作。彼得·范·霍恩还着重指出，孔子的思想构成中国社会的基础，而他的思想和构成欧洲社会基础的耶稣基督的思想是协调一致的。

现在，一位我所敬重的中国同事赵教授把一部荷兰人撰写的《欧洲文化史》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各界读者。这令我想起3个多世纪前一个荷兰人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的史实。如果这本小书能够把欧洲和中国这两种伟大的文化和学术传统进一步联结起来，可以说，它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彼得·李伯庚
2001年6月



译序

面对大海的断想

从大西洋岸、西北欧的布拉班古城来到东南欧地中海的克里特岛，离上次访问雅典登上奥林匹斯山，在阿克波里斯神殿的残柱中间徘徊，已经 55 年了。只是希腊的天空和与它相辉映的地中海，仍旧那样蔚蓝；滔滔海浪仍旧永不止息地唱着历史之歌。一部欧洲文化的 4000 年历史从这里开始，是有充分原因的。这是欧洲东南隅的海上边界，4000 年前（相当于中国夏朝），岛上的希腊居民在和埃及与中东各民族的海上经济文化交往中发展了欧洲最早的米诺阿文明，由海岛传入希腊本土。至于米诺阿文明和公元前 4 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及他建立的希腊帝国、公元 6 世纪查士丁尼和东罗马帝国的“盛世”，一直延续到 15 世纪中叶的拜占庭帝国，都早已没落，化为历史的陈迹，任人凭吊。报上现在还经常出现的惟有亚历山大皇帝的故乡马其顿，也只是因为那里的民族冲突发展为战争，不知如何结束。面对欧洲各国的兴衰，像眺望海水的涨潮和退潮，一个中国人想些什么呢？当然人各不同，而且有不同的想法，多总比少好。重要的是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历史道路和经验去认真思索，是不是这样呢？

* * * *

不久前，诗人怀宗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到海外，不论多久，怎么心里总也放不下中国？当时我回答不出，就像问我为什么爱母亲我回答不出一样。于是，这也成了我的问题，时刻纠缠在脑际，要求回答。

对现代中国人来说，爱国就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20世纪30年代，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因被纳粹迫害而流亡海外。有人问他：“你想念德国吗？”他回答：“我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中国人大概不会这样回答，想到中国时，总和那片土地的山川平原，那千千万万和自己一样的人连在一起；或许就因为中国幅员面积太大，中华民族人口太多，因而产生一种“万有引力”？

1822年，黑格尔在柏林大学讲《从哲学角度看世界历史》（《历史哲学》是后来英译本给它另起的书名）时，指出在有悠久文明的古代各民族中，中国人的特点是具有一种深刻的历史意识。可以就黑格尔的观察接下去说，历史意识并不仅仅是尊重历史，把历史事实认真纪录下来，而是树立一个衡量判断历史的标准。从历代统治集团来说，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表现为对自身统治意志的“深刻意识”：一切，包括修史，都要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而在人民大众中间，则另有一种对历史的深刻意识，表现为另一种衡量判断历史的标准，一切事情要看它对人民大众的态度。这是2000多年中国人民思想的传统，是中国文化 的传统。爱国不只是眷恋桂林山水、德州烧鸡……从根本说是爱中国的广大人民，爱中国文化的精髓。这是中国人无论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也放不下的。在历史中真正能够长存的，乃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实践所结晶成的文化。

国家、朝代有它的兴衰，文化也同样有它的兴衰。西方人读西方文化史，总要从埃及古代文化说起。但是埃及帝国的古代文化早已没落了，皇帝和美女都早已成为骷髅，化为尘土，只剩下少数考古学家、数学家还在研究：当初建造金字塔时，天文学和数学上的测算何以那样精确。巴比伦帝国的古代文化也早已没落了，亚述帝国的文化也早已没落了。文化悠久、民族强大，并不能保证“源远”就必定“流长”。阿诺德·汤因比研究了人类有史以来有影响的21种文化，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还继续发挥广泛

影响的只有5种，其他文化都已没落了。汤因比以西欧的基督文化圈、东欧的东正教文化圈、从北非到东南亚的伊斯兰文化圈、南亚印度文化圈和东亚文化圈来概括今日世界文化的不同类型，这是否最科学合理，也许还有可以斟酌的余地（克立佛·吉尔茨在《对伊斯兰的观察》一书中便指出了摩洛哥和印尼的伊斯兰实践多么不同），但重要的一点是它指出了文化有兴也有衰。

文化的兴衰以什么来衡量？主要看两方面：首先是看它对这个文化圈内部人民大众发挥的凝聚力和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二是看它对世界人类社会前进作出的贡献。离开这两条来谈文化兴衰，恐未免表面化。如果以这两条来衡量中国文化，怎样合乎实际地评估今日中国的文化状况？

文化怎样就“兴”？怎样就“衰”？欧洲人对自己的文化总是上溯到希腊罗马，现在所称谓的希腊罗马古典思想，实际是希腊人吸收了埃及和中亚各民族文化而初步形成的，罗马人兴起后，除吸收希腊文化外，又吸收欧洲北部克尔特人、日耳曼各族文化，以及北非各民族文化，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此后，8到15世纪间，欧洲人又吸收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间接还吸收了东亚文化），经长期与其他文化交流而发展成人们观念中的所谓“欧洲文化”。中国由于所处地理环境，在公元前，只是在东亚大陆的范围内融合各民族，发展自己的文化，比较自足。而后通过北方陆上的丝绸之路和南方海上的丝绸之路吸收了主要是南亚的佛教文化；当时大众思想是自由的，国家政策是开放的。因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世”。无论西方或东方的长期历史经验都表明，任何民族，愈是思想上谦逊、政策上开放，能吸收不同文化，自身的文化就愈兴旺；如果反过来，思想上自大，或政策上闭关锁国，排斥外来文化，自身的文化就萎缩。**具有深厚历史意识的中国人，是否认真从世界和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学习了呢？抑或沉醉在“历史文化悠久”之中，强调国情独特而排斥其他民**

族的历史经验，或是认为东方文化必将统合西方文化，以此为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前途呢？同样是在东亚的中国和日本，试以两国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比较一下。日本从幕府时期长期闭关锁国之后，1854年国门被美国炮舰打开，自明治维新起，吸收外来文化是全方位的、认真的，因此，它的现代化进程就比较快。中国在乾隆皇帝答复英皇乔治三世的信中，已经表现出一种文化思想上的自大。1840年国门被英国炮舰轰开之后，统治者在政治、经济上不能再闭关锁国，文化思想上却仍然是抱残守缺的。不知与中国的漫长历史有无关系，甚至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化界，对于从事介绍外国文化的学术翻译工作似乎也不如日本学术界翻译外国学术著作那样热心积极并且严肃认真。

19世纪的中国是西方列强侵略、掠夺的俎上肉。20世纪，被嘲笑为“东亚病夫”的亿万中国人，经过一个世纪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站立起来了。21世纪，将是中国走入世界的世纪。但是，中国人肩上既背负着“悠久文化”中的包袱，又背负了20世纪历史的包袱，能以轻松的步伐走进世界吗？世界人民对中国的古典文化是敬佩的，今日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从物质文化说，进步的地方是有目共睹的，至于精神文化方面就很难说了。到中国经商、旅游、进行文化交流的人们，并不都是来自西方国家，有的来自东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还有许多海外华人，也并不都是戴“反华”的政治眼镜，许多是对中国文化抱敬仰，对中国抱友好的感情而来的。他们的足迹踏遍全中国，总觉得中国的各种宣传和他们切身的经历有很大的差距，主要是在精神文化方面：今日中国大众追求的是什么？大众关心国家大事的程度如何？政治道德、商业道德、社会公共道德的水平如何？政府官员是否廉洁奉公、一心为人民服务？下一代年轻人的精神面貌如何？知识界既然受到更多的教育，是否因此对社会负起更大的责任，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今天出国的形形色色的中国人的精神

面貌如何？经过 100 年，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如果和 40 年代全民抗战时比较，和 20 年代五四运动时比较，和 20 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夕比较，有了哪些进步？这一切是否值得有头脑的中国人深思一下呢？其他民族的发展经验是怎样的？有没有值得借鉴的地方，还是中国国情特殊、文化优秀，不必也不能向其他民族学习了呢？这些是使译者困扰，在思想和生活的困扰中翻译这本《欧洲文化史》的原因。

* * * *

过去在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地方边教书边游学，一直留意，希望找到一本既能反映全貌，又摆脱民族偏见，又能反映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的优秀的欧洲文化史，可以介绍给国内的读书界。可惜孤陋寡闻，始终没有找到一本满意的书。其中，有自己的一份偏见，总觉得正如讲中国文化，首先要看中国学术界研究的成果，外国学者来讲，总不免有隔靴搔痒的地方。讲欧洲文化，首先还是要读欧洲学者的著作，头脑的知识和内心的触动是两回事，有切身体验和没有切身体验是很不同的。但另一方面，欧洲学者有时也有本国的局限性，需要仔细比较筛选。从北美转到西欧，向有关学者请教，终于找到了荷兰天主教尼梅根大学文化史教授彼得·李伯庚博士在 1998 年出版的新著《欧洲文化史》。荷兰在今日欧洲不是大国，但是在近代欧洲文化史上却有其自由思想的传统。15、16 世纪间，北部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潮中，鹿特丹的伊拉斯谟 (Desiderius Erasmus, 通常以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著称) 起了重要作用。在历史学方面，20 世纪上半叶的赫伊津哈是研究欧洲中世纪后期历史的重要人物。梵高是以他的绘画来进行文化批判的巨擘。李伯庚教授这本书，继承了文化批判的传统，就浅见所及，有几个特点。

第一，它破除了历来这类书的“西欧中心论”框架，把欧洲文化的发展放到欧洲和其他地区文化的相互关系中去考察。既抓

紧欧洲这个中心，又从世界史的全局去看欧洲，这是十分不容易的。本书的一个不足之处是没有把东欧斯拉夫文化圈包括进去。作者坦率地说，这是因为他不具备看古斯拉夫文献的语言条件，这是可以理解的。仅就西欧来说，要读的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和古哥德文等中古文字的文献就已浩如烟海。“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作者的严谨治学态度，是值得敬重的。

第二，着力把握欧洲文化历史中“一”和“多”的关系。中国以华夏族为中心的文化，自周朝起，以中央帝国政权更迭划阶段的帝国历史，其政治、文化中心和脉络比较清楚，比较容易处理。欧洲自古希腊帝国、罗马帝国和昙花一现的神圣罗马帝国以后，再也没有一个中心王朝，也没有一个中心民族，情况比中国历史复杂得多。古代便是希腊人、罗马人和北部克尔特人的三个世界并立。以后，克尔特人向西进入高卢，再向西登上英伦三岛。再有日耳曼人进入欧洲北部，又分为三支：有的其中还包括不同的小民族，分布在莱茵河地区、高卢、勃艮第、意大利半岛北部的隆巴第，定居下来；另一支消灭了西罗马帝国；还有一支进入伊比利亚半岛（今西班牙、葡萄牙）。由中亚台地经巴尔干半岛北部进入欧洲的各民族的来龙去脉，欧洲古代史学者也不能意见一致，不少问题还在研究中。如果从语言来分，可以大体分出拉丁、条顿（日耳曼各族）、斯拉夫语系的文化圈；在斯拉夫各族地区和西欧各族之间，还有一种混合东西欧文化的所谓“多瑙河文化”，以波罗的海和巴尔干之间的捷克、匈牙利、奥地利、罗马尼亚一线为代表。在多样性中，又能捉摸到其中有同一性，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从古代地中海东岸腓尼基人在地中海地区经商发展起的字母，转化为以希腊字母为基础的欧洲各国拼音文字书写体系；二是从罗马帝国公元1、2世纪发展起来的基督教会。宗教和民族、国家的关系又十分复杂。承认并且尊重、容纳这种复杂性正是欧洲文化的特性。从欧洲的情况和经验看，民族

经济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必然促进各民族的融合，而是促进民族意识的觉醒。宗教在其中又起了巩固和加强民族意识的作用。中国由于秦以后的大一统政治体制和汉民族在中华民族中的压倒性地位，因此对其他民族的特性、民族意识、民族宗教、民族要求常常不多注意；无论统治集团或自觉不自觉受它影响的思想界，往往喜欢强调统一性，不喜欢去认识客观存在着的多样性，有一种不自觉的统治集团和大汉族主义意识。这是否是值得注意的一点？

第三，对于文化的广阔视野和深入理解。通常的西方文化史讲到文化时，往往只指高级文化，而所谓“高级”，往往只是指学术论著、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是否精致，即所谓“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问题。本书却把大众文化如社会各阶层的不同生活方式、怎样支配闲暇时间等也包括进去。这不是单纯把文化范围看得宽一点或窄一点的问题，重要的是：它推动读者去进一步思考文化本身的特性。所谓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从政治和阶级意识形态来分析，是一种角度，在今日中国，多少已形成一种“人为的传统”。如果从文化本身来看，情况就不同了。把文化看为个人和阶级活动的自我表现，看为客观世界或个人主观世界的“反映”，这只是文化的低级阶段，而文化如果要进一步发展，它更重要的意义乃是面对现实，包括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社会、对人自身的批判性反思，这是社会和文化得以发展的动力，是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标志。文化的“高”和“低”，从根本上说，在于它能不能对社会（包括文化自身）进行批判，以推动社会前进；至于形式上的精致或粗糙，乃是第二位的问题。这是两种性质，同时又相联系，构成两个发展阶段的文化，它们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这样，文化变成活的，随时代经济社会变化而流动演变，它是主动的、创造的，而不是被动的、机械式的。文化的特性决定它的内涵，自然收集史料的眼界也拓宽了，使作者

能够注意发掘过去史家没有注意的新材料，为其他许多同类著作所不及。

第四，对当代中国人来说，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从文化发展的具体历史中把握上面所说文化的特性。从欧洲文化的历史发展经验中可以看出：欧洲文化在15世纪前，主要是认识外部世界，是重于知识的积累和消化。自15世纪起，欧洲内部的经济发展和对外部广阔世界的“发现”，推动了各民族的先进思想者对古典精神价值的新的追求，又以大众的语言文字和喜闻乐见的其他形式扩散到社会各阶层中去。这种追求既然产生于社会环境之中，自然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但它的特性不是仅仅消极被动地反映社会，而是积极主动地塑造社会的精神面貌，并且不断进行自我（包括对文化本身）批判，以推动社会前进。这种从精神上对社会及其各阶层生活方式的批判，是近代欧洲文化的特性，从这里可以了解近代欧洲文化与社会前进的轨迹。

对于当前欧洲，作者有自己的看法，读者或许有另外的看法。这并无妨。它至少可以帮助中国读者了解到，今日欧洲学术界人士中对今日欧洲有这样一些看法。

* * * *

译者学力有限，文字水平不高，译书其实是自己的学习，也是一个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点履迹。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指正，无限感激。本书得以出版，有赖霍英东基金会和铭源基金会的热心资助和国内外学术界同事的鼓励与多方协助，谨此致谢。

译者

2001年5月于克里特岛



导 论

在历史中的今日欧洲



人只要努力，就会犯错误。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序幕中
神僧视苍生时所说的一句话

欧洲——是一个梦吗？

欧洲是什么意思？通常它会被看为一个天然的事实，是一个独立的大洲，有鲜明的人文地理个性。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欧洲从根本上说来是一个政治和文化概念。地理上，它处于欧亚这一整块大陆的西部，称它“欧洲”，乃是那里的知识界由于实际需要而命名的。什么时候会产生这种需要呢？往往是在与其他地区对峙的危机之中。归根究底，人们总是由于客观上的需要而反思自身，给自己下定义，并且去描绘自己的特性。

为什么会出现“欧洲”这个概念的问题，联系到另一个问题即：“欧洲”这个名称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谁最先使用这个名称？同样重要的是要弄清，在历史的不同时期，这个名称的含义是什么？是谁感到使用这个名称，对他们具有切身的意义？以往说到“欧洲观念”时，往往是指一个“乌托邦”，或作为知识界的宣传工具。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过去历史上，无论是知识界还是对于不使用这个名词的大众



A CULTURAL HISTORY
Europe

欧洲文化史

来说，欧洲就从来不是一个现实，以至如尼采所说“不断重述一个梦幻，就能把它变为现实”。

这些问题将把我们带回遥远的历史中去，然后我们才能再看19世纪以后，或更近的二次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欧洲观念”这个词。它是政客，主要是经济学家和律师们，按照自己的理想而使用（或有时玩弄）的概念。他们是为了使欧洲不再用武器毁灭自己，而把欧洲看为一个“文化”或“文明”，具有自身特点的一个统一体；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需要，为推广“欧洲一体化”而赋予它一个意识形态的基础。于是，如同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样，“欧洲”被用作现代社会的理想，藉以实现把欧洲融为一体的梦想。但是，他们为促进实现一体化的梦想所作的努力，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后果，就是用“一个欧洲”的理想来取代地区、民族的属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让我们对历史进行一些分析，从文化上看有哪些现象足以促进今日欧洲文化的融合。

写作一部欧洲文化史需要考虑的问题

写作历史不免令人陷入文化、政治，甚至是道德的困境。历史学家写作时，跳不脱自身的文化背景，更跳不出自己。如果他们不能把历史的情景用现代语言描绘出来，读者就不会爱看。但是，如果历史学家过分为自己的时代所限，作品很快就会过时。我对欧洲的探索，必不可免地要同时踏几条路线，有的道路还未曾有人走过，有的道路却早已被人踏过了许多遍。我的漫游会把读者带向哪，要由读者来评论。我的希望是这本书在自身时间、空间的限制中，选择欧洲文化历史的某些领域，向读者指出一些可以辨认的标志，从而激发起思想。任何旅游者的观点总不免受以前到过那的旅游者报导所影响；然而自己去看时还是会有新的体验。在旅途中，

我们的立足点和着眼点会不时变换；同样，当我们进行关于欧洲的思索时，它的轮廓线和特征也会不时变换位置。

自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使用“欧洲”这个名词迄至今日，历代人们对欧洲已经想了、写了、说了许多。欧洲曾被描绘成一个亚洲公主、一个希腊的半人半神，或世界的女后。用以比喻欧洲的形象与文字激励着人们的感情。不同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推动人们去创造现实，又以不同方式塑造了欧洲，以至欧洲几乎只成为一个客观的地理概念。因此，今天的欧洲或多或少只是欧洲居民之间的一种意识情结。它处于梦想和现实、思想和行动的紧张关系之中；同时，又成为欧洲人用以区别自身与外界的一个标准。

本书并不是要总结这一切，也不想对欧洲的含义加以规范化，因为欧洲还在变化之中，不断以新的方式形成自己，难以一劳永逸地制定它的规范。欧洲意味一系列的世界观，人们对自身现实的各种观点，有时只是梦想或心愿，有时又成为经验和体会。当写完本书初稿时，我更深深地意识到这一点。出版社自然要把书稿送给一些专家和书评家，请他们不署名地从学术价值和市场价值两方面对本书作出评价。这些评审意见也帮助我准备接受这样一本欧洲文化史问世所带来的各种评论。

有的评论家猛烈攻击我忽视基督教传统中《圣经》的作用。另一些则认为我过分强调了基督教对欧洲文化的影响。他们还认为，一部欧洲文化史应当谴责基督教会（或以它的名义）曾犯的过错与罪恶，表明欧洲历史并非毫无污点的。

有的评论家指责我没有更强调劳苦大众在形成欧洲过程中的作用，没有指出在欧洲或世界其他地方劳动人民为历史所付出的代价。另一些评论家则发问：在一部文化史中，有什么必要花费这么多篇幅去谈经济和政治背景？

有的评论家认为这部书没有注重他们的观点，即文化史



应当是对伟人和伟大思想的歌颂。另有评论家认为，本书还应列入几十位其他文化伟人，他们的文学艺术、音乐创作是欧洲文化最宝贵的遗产，甚至是欧洲文化的本性。这些评论家认为应该增列的文化巨人，通常都是他们本国同胞，这也不足为怪。如果按照这些意见去做，开列欧洲文化巨人的名单，只会引起无穷的争论；但有些评论家并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

最后，少数评审家认为我一定是拿了欧洲联盟的钱，为那些权力经纪人的意识形态申辩。另一些则认为我对欧洲独特的价值的现实状况，以及在这价值基础之上的欧洲联盟都过于悲观。

如果说，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我学到了一点什么，那就是欧洲的过去——无论是源自宗教、道德、民族主义还是政治观念——在今日欧洲引起了多少激情。这些激情都是十分真实的，而且，我也意识到欧洲继续在变化，每个人、每个团体都有自己对欧洲的看法。这一切使我甚至怀疑，是否应当放弃写这本书的念头。但是，尽管上述各种批评意见都不无道理，而我自己写这本书的乐趣却使我决定继续写完它，并且尽我所能，在各种问题上提供一个比较平衡的看法。

关于定义

历史写作意味着作出抉择，作者要考虑各种复杂的因素，包括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假定读者有兴趣的是哪些问题，和在无数杂乱无章、往往相互矛盾的史料中何所取舍的问题。最后，所有这些抉择都进入所写的书中。但说到最后，对历史的理解中包含了作者立足于今日，对历史提出了什么有意义的问题。

在这样的思想笼罩下，写作一部“欧洲文化史”实在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要决定这部历史故事的时间跨度，更重要的是必须考虑，从地理和文化上看，欧洲应该从哪开始，到哪里结束。这就要求对构成本书的两个要素——欧洲与文化——作出定义。

欧洲大陆通常被界定为从挪威最北部的北角到南端的直布罗陀，从爱尔兰西岸到乌拉尔山脉。是否要把在此地区范围内发生的历史事件巨细不捐地都写下来呢？还是着重写那些为我们了解今日欧洲文化有帮助的历史事件呢？与其写一部无所不包、百科全书式、令人无法卒读的书，我决定按后一种思路来写作本书。这样做就意味着我已经限制了本书要包括的欧洲地理范围和要讨论的文化因素，即使这样做会令有些读者感到某种失望，甚至痛苦。

有的历史事件，由于无数地理——经济、地理政治和文化——宗教方面的发展，需要追溯到数千年以上。有的历史事件虽然源起于近代，却由于内部分解带来了欧洲文化的多样性和交叉重叠性。最明显易见的是东欧与西欧的不同。在东欧与西欧之间的分界线其实是一条宽阔的过渡区，它有时被称为“中欧”，从波罗的海延伸到巴尔干，大体相当于今日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本书主要是记载上述过渡区以西的历史事件（但也不是绝对的），对中欧各国叙述得较少，对东欧则涉及更少。从学术和政治上的正确性来说，应该把中欧和东欧包括在本书范围之内，但我没有这样做。首先是因为我缺少必要的语言能力来深入研究有关文献；其次，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感到中欧、东欧在历史上与西欧就是分立的。在西欧，由于无数“偶然”的因素，使不同地区的文化联结起来，从而它们的发展日益接近，最后形成一个广泛的共同经验。尽管其中有许多不同的因素，从总的的趋势看，还是趋于一致。

这个地区的相对一致性是由于在加洛林帝国瓦解后，在